

克立和泰国有关人士对《忽必烈
平大理国是否引起泰族大量南迁》一文
的 介 绍 与 评 论

云 南 省 历 史 研 究 所

一 九 八 一 年 五 月

目 录

克立·巴莫亲王的译述·····	(1)
克立·巴莫亲王的评论·····	(7)
泰族南下了吗? ·····	索·讪威迁 (10)
到勐些, 游农些·····	德初·沙瓦那暖 (16)
南诏是我们泰族的国家吗? ·····	素察·蒲媚波里叻 (22)
《泰人抛弃故土》一书的跋·····	讪雅·彭巴昔 (33)
从泰族史说起·····	颂朴·彼隆 (36)
关于南诏和泰族发源地的新观点·····	他侬·安南瓦等 (41)
附录:	
<u>忽必烈平大理国是否引起泰族大量南迁</u> ·····	杜玉亭 陈吕范 (43)

克立·巴莫亲王的译述

编者按：我所杜玉亭、陈吕范合写的《忽必烈平大理国是否引起泰族大量南迁》一文在《历史研究》1978年第2期发表之后，泰国驻中国大使馆二秘沙拉信·威拉蓬先生立即设法将它译成英文分发给泰国学术界。泰国前总理克立·巴莫亲王根据沙拉信先生提供的英译稿摘译为泰文，于1978年6月28日起接连三天在曼谷《沙叻报》他主持的“擂台畔”专栏上进行刊载。除了个别段落是全译以外，克立亲王只是摘译文章的主要内容，然后以综合转述形式向读者介绍文章的概要。现将这三天的专栏文章全文译出，供参考。由于泰译稿是由英文转译的，不少地方与中文原文有所出入，我们都加了译注。黑体字是泰译稿原有的。克立的“擂台畔”专栏文章一向没有另加标题，故我们称为《克立·巴莫亲王的译述》。

我从泰国驻北京大使馆沙拉信·威拉蓬先生处得到一份英文文稿，它是刊登在中国史学杂志《历史研究》上的中文文章的英文译本，题为《忽必烈平大理国是否引起泰族大量南迁》，作者是中国两位史学家杜玉亭和陈吕范。

这篇文章否定西方史学家所主张的理论，这些西方学者说，当蒙古军队进攻云南大理府的时候，引起了云南泰族大量南迁，进入缅甸、老挝、越北和泰国，特别是迁徙到目前成为泰国的地区的泰人，对该地区历史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关于泰族的起源以及泰族究竟来自何方，这是一个长期以来就引起人们进行研究和探讨，而迄今尚无明确答案的一个历史问题。

我认为，两位中国史学家当前撰写的这篇文章，值得引起泰国史学界的重视。因此我特意译成泰文，以供研究。

至于我本人没有什么意见，即不对该文在任何方面表示同意或反对。我仅仅以关注的心情阅读了该文的英译本，并将它转译成泰文以飨读者而已。有的段落我将根据个人的理解进行转述，并将某些认为必要的段落直译出来，希望它对关心历史和考古的人们将会有所帮助。

文章引用了大量文献作为考据，其中绝大部分是中国的史籍。文章开始就直接驳斥了西方史学家关于十三世纪忽必烈平大理国引起数以十万、百万计的泰族大量南迁的说法，认为这种说法篡改了十三世纪本已十分复杂的历史。文章提到的西方史学家有H·R·戴维斯、W·C·杜德、W·A·R·吴迪等，他们以及未提到名字的西方史学家在五、六十年前的著作中就宣称，忽必烈平大理时，“当地的泰王国遭到覆灭，导致全体居民南迁”。

文章承认忽必烈确实占领了大理国，但认为由此而引起泰族大量南迁的说法没有历史依据，也毫无事实根据，通篇都是谎言。

文章指出：产生这种理论的原因，来自西方史学家的一种迷信，即认为曾经征服欧洲和中亚一部份地区的蒙古军队，具有无敌的赫赫武功，以致于产生敬畏心理，并一直延续了下来。所谓泰族为逃避蒙古军而南迁的理论，就是产生于一直深深地烙印在西方

史学家意识里的敬畏心理。并且因此臆测“泰族王国的完结”。

下面用泰文将文章中的一段翻译出来。

“在忽必烈平大理国中，军事力量确实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一二五三年，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率军十万，进入四川与甘肃^①，然后兵分三路，‘乘革囊及筏’渡过了金沙江，不到一年时间就灭亡了割据云南数百年的大理国。当时，四川中部与东部仍在南宋的统治之下，所以，这次进军的路线经过四川西部和川滇边区高山峡谷人烟稀少之地，出奇制胜^②，而大理国的被平定，便使云南这一南宋的后方，一变而为包围南宋的重要基地。这说明，忽必烈平大理确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一战，如果没有善战的军队和将领，这一胜利是不可能的。然而，蒙古贵族之所以能迅速平了大理国^③，并且确立了对云南的统治，除了武力这一手外，还有十分重要的一手，这就是：分化和利用原大理国的统治者，将他们的传统力量充分调动了起来。从某些方面讲，这一手的重要性并不亚于武力的作用。这一不容忽视的基本历史事实，恰恰是‘泰族大量南迁论’者的致命处。

“在平大理国的军事行动中，忽必烈在分化和利用对手以创造战后的安定方面是很注意的^④。为了招降大理国主，忽必烈在进军途中曾两次派出使者，头一次是从甘肃派出的，没有达到大理；第二次派出的使者又被大理国主杀害。但在渡过金沙江后便接受了‘摩娑蛮主’（纳西首领）的‘迎降’。在进攻大理城时还改变了“屠城”政策，下了‘缓杀’居民的命令^⑤，并对大理国贵族进行了区别对待：对顽抗不降的“权臣”高祥，采取了杀头的办法，对虽曾进行抵抗但愿意归降的大理国主段兴智，则加以收买利用。结果，蒙古贵族对大理段氏采取的措施，很快就见成效。一二五五年和一二五六年，段兴智两次入觐，向元宪宗皇帝献上了云南的地图和征服未降部落的计划。蒙古王听罢大喜，当即赐给他一个梵语的名号——‘摩诃罗嵯’，并命其主管云南各部落的事务。此后，（云南）段氏^⑥确也没有‘辜负’蒙古贵族的期望。”

总之，文章指出：蒙古人对云南的侵略是为了征服大理国以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胜利后，处置了一批敌对的人，但对大部份人并未加以欺侮凌辱，而且对大理国主进行安抚，并结为友好，使得多数人没有遭受蹂躏的苦难或死亡。

所以，并不存在西方史学家们所说的引起泰族大量南迁的任何理由。

上述论据，作者主要引自《元史》。

介绍未完，待续。（以上是六月二十八日的专栏文章）

六月二十九日，克立继续在《沙炎叻报》“擂台畔”发表无题的专栏文章，译文如下：

①中文本为“经甘肃入四川”。——译者

②中文本为“以大迂回的战略出奇制胜”。——译者

③“之所以能迅速平了大理国”一句，中文本为：“所以在今四川、广西、贵州属于南宋的条件下迅速平了大理国”。——译者

④“忽必烈在分化和利用对手以创造战后的安定方面是很注意的”一句，中文本没有“以创造战后的安定”这几个字。——译者

⑤中文本为“下了‘止杀’的命令”。——译者

⑥中文本为“大理段氏”。——译者

今天，我将继续发表当代中国史学家驳斥所谓泰族为了逃避蒙古人而从云南南迁主张的文章，今天可能还结束不了，也许还需若干时日。

如果全文照译，都登出来，显得有些冗长，所以只能作些简要的介绍。

他们说，当时居住在云南的泰族和其他各族人民，为了自己的自由进行了十分艰苦顽强的斗争，并不象后来人们尤其是西方学者所相信或臆测的那样，他们并未迁徙往任何地方。

唐玄宗时曾先后两次派出大军进攻南诏，每次军队的数量并不比元代蒙古军队少，进攻的地区也没有元代广，但唐朝的军队反而两次都遭到失败，损兵折将，溃不成军。

忽必烈征南诏时率兵十万，在战争中损失不少，仅剩下数万人，而且统治了云南、四川、广西和贵州。这里，除了蒙古军队官兵的善战外，归降忽必烈的大理国主为忽必烈打先锋，出主意，也十分重要。

正是大理段氏为蒙古军队当响导，打头阵，才平定了云南的未附部落。而蒙古贵族则笼络利用大理段氏，不仅让其继续“主国事”，而且命令云南“万户”以下军政官员受段氏委任，因此，这就给蒙古贵族征服南诏未降部落一事，披上了一层外衣，大理段氏还帮助蒙古贵族把势力扩张到东南亚的越南。

大理段氏对忽必烈立下的“功劳”，是对云南各族人民大起义的镇压。一二六四年（佛历一八〇七年），云南爆发了十万人的各族人民的大起义，起义军发展迅猛，很快占领了新兴、石城、威楚、昆明等许多城市，蒙古守军无法抵挡，就向大理段氏政权求援，大理政权头目信苴日发兵援救，与蒙古军联合夺回上述城市。

这次大起义持续了十余年，曾经几起几伏，最后是以起义领袖舍利畏的被害而告终。

根据上述论点，文章的作者得出如下结论：南诏之所以被蒙古贵族征服，主要的原因是南诏的统治者向忽必烈妥协，并协助蒙古贵族镇压敢于反抗的人民。

这说明：南诏的泰族并未迁往何地，而是在原地坚持殊死的斗争^①，直到最后一个人也要死在南诏的土地上，没有迁往素可泰或任何地方。

在以后元朝对南诏的整个统治过程中，蒙古贵族都放手让南诏王实行自治，以后到了中国的明代，对南诏仍然沿袭了这一政策。但是，在元朝末年，蒙古贵族开始限制云南地方官的势力，大理的南诏王只授了一个蒙化州知州的头衔，不再像过去那样对大理实施全面统治。大理国主的后裔也只授上述官职，但却照旧驻治大理。最后矛盾激化，从而爆发了大理段氏与元朝在云南的代表或总督——梁王之间的战争，大理段氏便割据了滇西，梁王也无可奈何。

明朝统治中国后，发兵三十万征讨元朝在云南的梁王，梁王自杀，但云南的段氏仍然据守不降，中国军队和云南军队发生战斗，而且取得胜利，并俘虏了两名段氏兄弟，押往北京，委任给他们一个无足轻重的职务，安置于云南以北的中国内地。从此，当地的官员即被解除职务，由北京委派的中央官员进行统治了。如果说在那时有任何迁徙的话，也只是北迁，而不是什么南迁。

^①对舍利畏领导的起义，中文本说是各族人民大起义，但克立·巴莫却把它说成是“泰族在原地（云南）坚持殊死的斗争”。——译者

大理国段氏家族是白族，在他们统治下的人民，除了作为主体民族的白、彝两族外，还有傣或称泰、哈尼、纳西、傈僳、阿昌等许多民族。没有任何历史依据说明他们南迁。主要聚居在今西双版纳和德宏州的傣族，从未迁往何地，历史记载他们一直生息在中国。远在西汉时期^①，有关傣族的记载更为明确而具体，他们被称为金齿、银齿、黑齿、茫蛮、白衣等等；他们的分布地区连成一片，从红河两岸到怒江以西，直到中国北部的保山和景东^②，以农业生产为主，并有用金银饰齿和用色彩纹身纹脚的风俗，以致中国人称他们为金齿和银齿。十二世纪末叶，西双版纳景洪的傣族首领叭真，联合其他部落，建立了“景龙金殿国”。据记载，这个政权向天朝皇帝俯首称臣，并在某些问题上和天朝发生关系^③。这说明，傣族在中国的历史是按照必然的规律而发展的。

就此搁笔，明日继续转述。

六月三十日，克立继续在《沙叻报》“擂台畔”发表无题的专栏文章，全文如下：

有关云南泰族是否南迁的问题，文章继续提出下述考据进行论证：从元明以来，对云南的统治主要是依靠当地的土官，元朝任命的土官是泰族^④，所以并不存在什么引起泰族南迁的因素。

据元代李京编纂的云南地理志^⑤记载，李京称之为白夷的泰人，在云南为数最多，北至吐蕃，南抵交趾——即越南南方^⑥。可见，泰族在元代云南的分布是相当广的，其居住地区仍与今天的情况大体相同。据元代的有关记载，泰族不仅不存在什么南迁，相反，某些文献的记载则是向北迁徙，如：今景东和景谷等地的泰族，就是唐宋以来由南向北迁去的。

至于居住在泰国的泰族，文章指出：泰族是泰国的土著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绝非从任何地方迁徙去的。

早在远古时候，泰族的先民就和中国有着友好的往来。据《后汉书》记载，公元一世纪末二世纪初（一千八百多年前），永昌徼外的掸国国王雍由调，曾于公元九十七、一二〇和一三一年，三次遣使到东汉首都洛阳访问，受到中国朝廷很好的接待。皇帝赐给雍由调金印紫绶以及汉大都尉的封号。（雍由调）第二次派遣的使团，还向东汉皇帝献了乐队和魔术师，并为皇帝作了多次精彩表演。而随从掸国使者的翻译，辗转翻译了两三种语言，才能和中方通话，这表明掸国与汉朝在民族语言和地域上的距离是相当遥远的。

（雍由调）第一、二次的使团来自永昌徼外，即取道东汉时中国的保山，但第三次使团是取道日南徼外，即经过现今越南中部地区。这说明远在一千八百多年前，泰族的

①不是西汉时期，中文本为“唐宋时期”。——译者

②不是中国北部的保山和景东，中文本为“北到保山、景东”。——译者

③中文本为“同内地有着某种从属关系”。——译者

④“从元明以来，对云南的统治主要是依靠当地的土官，元朝任命的土官是泰族”一句，中文本为“从元明以来的有关记载看来，傣族地区仍主要是利用当地原有的统治者——‘土官’进行统治”，而泰文译稿将“傣族地区”改为“云南地区”，这样一来，同中文本的原意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译者

⑤此书名《云南志略》。——译者

⑥中文本为“南抵交趾”，没有“即越南南方”这几个字。——译者

先民就已生息在今中印半岛北部的广大地区。

掸国虽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是，兴起于一世纪强大于三世纪，以今柬埔寨为本土的扶南，以及六世纪中叶兴起于中印半岛的真腊王朝出现后，掸国就沦于它们的统治之下。在这漫长的时期，泰国曾出现过两三个小的国家，泰族人民为了反抗外族的统治，曾进行过几个世纪的斗争。到了十三世纪前期，泰族建立了以素可泰为中心的素可泰王国。中国史料称之为暹罗（沙炎）。素可泰王国与元朝在政治上文化上保持了密切的交往，见于《元史》的素可泰朝贡的记载就有十处。一二八二年六月，忽必烈派管军万户何子志和其他官员出使素可泰，因途中出了事故而未到达，但十年后的一二九二年，广东宣慰司却把素可泰国王上的“金册”（御书）送到北京。一二九五年，素可泰国遣使向北京进金字表，请求向素可泰派出使节，但暹国使节到达元朝京都时，元朝派出的使节已经先行出发，为此，元成宗皇帝特地赐给（暹国）来使素金符，使其火速追赶中国使节一同去素可泰。值得注意的是，素可泰国著名的国王兰甘亨（敢木丁），曾根据元朝的“和平招谕”^①遣其王子入朝，并贡过虎象等物，而中国皇帝也赐给兰甘亨国王鞍辔、白马数匹及金缕玉衣，并赐给其世子以“虎符”。从元朝竟然招谕兰甘亨国王来朝及国王子弟入质来看，其以“天朝”“宗主国”自命的姿态来对待其他国家是十分清楚的，但是，元朝并没有对素可泰发动过战争。

这里，需要作一些解释。素可泰国时期，中国以大国自居，自命为负有维护世界这一地区安定之责任，其他国家出于对中国武力的敬畏，也接受这一事实。当时，兰甘亨国王在黄金半岛实力雄厚，周围国家特别是柬埔寨深感畏惧，中国皇帝可能接到柬埔寨的请求，要求制止兰甘亨对他们的侵略。为此，中国皇帝才“和平”招谕（Sammon of Pacification）兰甘亨及其世子前往中国，并将其世子作为人质，以制止其父王对其他国家发动战争。^②

据《元史》记载，兰甘亨国王并未按照中国的招谕亲自前往，而只是将其世子入质。对此，中国可能感到满意，所以未向素可泰发动战争。

文章指出：素可泰国是在泰族人民的推动下独立发展起来的，因而，什么素可泰国是泰族自云南南迁然后建立的说法，乃是无稽之谈。

文章还提到一个使人十分感兴趣的问题，即明代中期^③征八百媳妇（八百个妻子或八百妃子）。文章说，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因为八百媳妇国的首都就在今天的清迈。

八百媳妇就是兰那泰，我们似乎没有谁知道在明朝时曾被中国占领过，而该文引证了这一事件，但未详述。文章反而谈到元朝时发生的事件；当时清迈将自己的势力扩张到云南的大、小车里，这可能指的是西双版纳的勐勐。元成宗皇帝勃然大怒，在公元一三〇〇年（佛历一八四三年）派出大军攻打清迈，当中国军队距清迈还有一千公里之遥时，因为横征暴敛而遭到无法忍受的彝族人民的反抗，二万中国军队陷入围困，被打得一败涂地，中国军队的将领刘深也被斩首。但是，清迈（指八百媳妇）可能意识到这一

①中文本为“招谕”，克立用来翻译的英译本译为“招安令”（Sammon of Pacification），故克立译为“和平招谕”，显系误解。——译者

②这段话是克立·巴莫自己所作的解释与发挥。——译者

③不是“明代中期”，中文本是“元代中期”。——译者

问题，因此，他们通过向中国贡献驯象及方物，清迈和元朝的关系很快好转了。

明朝时，中国军队何时为何原因进攻清迈^①的细节，文章并未阐明。我本人对中国历史懂得不够好，元明两朝如何交替的，我也不清楚，似乎感到有些茫然。

文章作者认为，文中所例举的历史上发生的各种事件，都证实了泰族并未南迁以逃避蒙古人。

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为什么这样惶惶不安？我同样不知道。

他们在结束语中说：西洋人所制造的这种理论，不仅是对云南各族人民的诬蔑，也是对具有悠久和光辉历史的泰族人民的诬蔑。

但是，无论如何，文章通过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提供了有关泰族的好些情况，这对历史研究大有好处，值得重视。

如果谁对该文的英译本感兴趣的话，请与我联系，我可以复制奉送，但是，如果成百上千的来要，我就无能为力了。

简佑嘉译 谢远章校

①不是明朝，中文本是说元代中期征八百媳妇这一重要历史事件。——译者

克立·巴莫亲王的评论*

我曾将当代中国历史学家关于古代泰人文章的内容连续三天在这个专栏发表，其中有些关于泰人过去的一些情况，是很值得引起历史学家重视的。

说实在的，我们泰人对于自己的过去是知之甚少的。

我们还不能确切地知道我们起源于何地。

曾有西方史学家假设，我们起源于中国北部十分寒冷的阿尔泰山，以后逐步向南迁徙，一直到我们今天生息的泰国这个地方。

法国历史学家雷·庇诺教授很早以前写道：当泰人由最北边向南迁徙的时候，曾有一只小小的亚洲野狗跟随而来，后来变成了我们的泰国狗。

我对雷·庇诺教授的理论相信的程度如何那是另外一回事，但关于有一只狗跟随而来这件事我是相信的。因为我是一个狗的爱护者，关于狗的这件事我自己就可以证实。

现在我无论到什么地方去，不管北上或南下，也无论是爬山或涉水甚至乘船泛舟，经常有一只泰国狗跟着。

不，这条狗不是三色，因为三色是尔后才来入伙的西洋狗^①。

关于泰人来自北方的理论，目前已有历史学家或考古学家开始产生怀疑，有几位认为，泰人不是从其他地方迁来的，而是起源于我们现在居住的地方。

泰人目前所居住的地方不算小，因为不仅仅只是泰国那么一块地方，而是包括了中国的几乎整个云南、四川、广西和贵州，越南北部的莱州和奠边府地区的一部份，还有缅甸北部的整个掸邦、老挝以及泰国。

上述整个面积相加，几乎和中国的面积相等。

此外，在中国北部的某些地方还有泰人，中国说他们是由南往北迁去的，而且还有居住在海南岛的原始泰人，这些泰人是从中国南部或越南北部的某个地方迁移去的。

我读了所刊登的文章（译注：指《忽必烈平大理国是否引起泰族大量南迁》一文）以后感到，现代中国历史学家也持有这种观点，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写了这篇文章来驳斥西方历史学家所谓的泰人是从北方即云南迁入泰国的说法。

其实，在他们那篇文章的结语部分，有一段我没有把它登出来，因为它只是简短的结束语，但是他们中国人相信：已经有六千年至七千年的班清文化是泰人创造的，六七千年前的班清人也的确是我们泰人。

其实，从北碧府发掘的史前骨骼来看，其体型与现在泰人的骨骼的体型是没有多大

* 本文译自1978年7月1日曼谷《沙炎叻报》“擂台畔”专栏，这是克立·巴莫亲王对《忽必烈平大理国是否引起泰族大量南迁》一文发表的无题评论。译文中的黑体字是克立的评论中原有的。

① “三色”是克立最喜爱的一条狗的名字。——译者

区别的。

关于泰人的起源和从什么地方来的问题是一个明摆着的问题，我们还必须继续深入探讨，以丰富我们在这方面的知识。

看来要寻找充分的依据还得到中国去，因为中国人很善于记载他们所发生的事件，以及喜欢搜集他们所了解的其他民族的各种具体情况，这些记载与具体材料我认为还存在，因为前面我所介绍的那篇文章引用了大量的史料。

仅就那篇文章而言，就有许多值得我们了解的具体材料。

譬如，一千八百年前的汉朝时候，泰国国王曾派遣使臣前往洛阳，而且还带去一个奇异的乐队与技艺高超的演员。这就表明，在一千八百年前，我们泰族的艺术和文化当时已经受到其他民族的赞扬。

此外，还有关于素可泰时代的泰国的一些具体情况也值得我们注意。

我们已经确切地知道，兰甘亨国王并没有象我们过去所相信的那样去过中国。

到中国去的只是当王储的王太子。并且是以人质的身份前往，旨在不让他的父王在这一地区进行战争，扩张势力。根据元朝安邦定国的政策可以看出：兰甘亨的威力一定已强大到足以使其邻国惧怕，所以他们才去向中国皇帝呼吁，要求进行干预，“维护安宁”。

在当时，由忽必烈汗建立的元朝，必然是武功赫赫，东南亚各国对之很畏惧。每当中国提出什么呼吁，譬如说要求相互之间不要发生战争，大家也就听从了。这样，中国也就维护了安宁。然而中国的势力仅局限于素可泰时代，到了大城时代就已经结束。明朝时期，中国也就不能维持东南亚的安宁了。到了清朝，中国几乎已没有什么势力可言了，因为满人建立的大清朝主要忙于维护自身的权力和中国国内的安定。

在当时，各个泰王国当中的清迈，似乎原来从未屈服于中国的势力之下。甚至还将势力扩大到了西双版纳，因而导致中国派兵前来征讨。但当中国军队还没有到达清迈时，由于发生了意外的事件，军队就溃散了。仅仅如此，就使得清迈必须向中国表示屈从，并送去了很多贡品，以沟通友好关系。

中国将清迈称为“八百媳妇”，是切合实际的。这就表明清迈早已闻名于世。

我有点同情中国。

因此，如果要想更多地知道泰族的过去，就必须到中国去探索。

关于这事，我曾经问过他们，而且表示，我对于从中国文献研究有关泰国的情况，以及和居住在中国的为数众多的泰人接触都很有兴趣。

但当我提到这件事的时候，他们总是支支吾吾地犹豫不决，他们可能认为我是要去鼓动那些泰人的民族情绪，或是还隐藏有其他政治上的原因。

事实上，我所关心的仅仅是学术问题。

不管怎么说，除了云南之外，还有很多泰人在其他地方居住，譬如在贵州^①的泰人自称为壮，而且说的泰话可以听懂。

一见面就很亲热地自称孤，叫对方为盟。

①可能系桂林之误。——译者

我去了以后才得知，壮族把男孩称为“鲁嗯”，女孩的称呼和泰人一样叫“鲁骚”。

因此，我国的老年人把儿孙叫作“嗯”，并不是含有轻蔑意味的语言，仅仅是长辈对男孩的一种称呼而已。但后一个“嗯”却不知该译为何意？

于是，我产生了一个想法：当前中国人所写的关于泰人历史的这篇文章，就其写作的愿望而言是友好的。

他们并不想使我们产生我们过去曾相信过的所谓被他们驱赶出来的说法。

历史可以古为今用。

我们泰人也具有不亚于任何人的历史。

如何使我们的历史发挥作用，是值得我们大家深思的。

请不要忘记，兰甘亨国王没有去过中国。

简佑嘉译 谢远章校

泰族南下了吗？*

——来自中国的新论据

索·讷威迁

泰族起源于何地的问题，虽然经过多年的研究，但是在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之间尚未取得一致的看法。因而，当发现有新的论据时，必然是一件值得关注的事。曼谷《沙炎叻报》“擂台畔”专栏主笔克立·巴莫亲王，从泰国驻北京大使馆沙拉信·威拉蓬^①先生那里，获得的一份题为《忽必烈平大理国是否引起泰族大量南迁》文章的英译稿，该文原为中文，发表在中国的史学刊物《历史研究》上，作者是中国史学家杜玉亭和陈吕范。克立亲王根据该文的英译稿转译成泰文并加上自己的看法，在该专栏上发表。

我读了克立亲王的文章后，认为这是十分重要的新论据，它和一位泰国人原先依据中文史料编撰但流传不广的著作的内容^②是吻合的。如果我们用刚得到的文章和过去的文章两相对照，或者可能对上述问题得出某些看法和（发现其）重要意义。为此，请允许我提供我所编撰的以下有关内容：

佛历一七三八至一七六七年（公元1195—1224年）之间，中国正处于宋朝末年第十三世皇帝宋宁宗的统治下，宋宁宗是宋光宗之子，宋孝宗（宋朝第十一世皇）之孙。宋孝宗在位时，宰相赵雄，当时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金朝和中国（南宋）之间的战争停了三十年，到佛历一七五〇年（公元1207年）宋宁宗当政时，金朝又举兵入侵中国（南宋），当时蒙古王成吉思汗的势力日益壮大，征服了西夏，并向南方和东方扩张势力，中国（南宋）联合成吉思汗讨平金朝，导致蒙古人占据了北方省份，不愿归还，这就是蒙古人发动侵略的开端。

佛历一七四八年（公元1205年），宋宁宗当政时期，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或称忽必烈汗派大军征服了匈牙利，并占领了欧洲东部地区。

四十二年后，即佛历一七九〇年（公元1247年），在一本《泰中两族关系史》（译注：利吉·云达恭著，一九七三年出版）的书中说：忽必烈举兵战胜西藏，同时占领了

* 本文译自曼谷《首都人》月刊1979年11月号，作者索·讷威迁系人体解剖学专家出身的考古学家，艺术大学考古专业艺术荣誉博士，现已退休，任玛希敦大学荣誉教授。

① 沙拉信原系泰国朱拉隆功大学政治系国际关系专业讲师兼该系学报《社会学》主编及亚洲研究所中国研究会会长，1976年到泰国驻北京大使馆任二秘，现已调回泰国执教。——译者

② 指吉利·云达恭著《泰中两族关系史》，一九七三年出版。——译者

中国云南省地区。这段内容和克立亲王用来翻译的英文本的内容是一致的，（克立亲王的）译文说：

“忽必烈确实以武力征服了大理国。公元1253年，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率军十万进入四川和广肃（译注：系甘肃之误），然后兵分三路，乘革囊及筏，渡过了金沙江，不到一年的时间就灭亡了割据云南长达数世纪的大理国（时间和利吉·云达恭著作的记载相差三年）。当时，四川中部和东部仍在南宋的统治下，所以，这次进军的路线经过四川西部高山峡谷和川滇边区人烟稀少之地，出奇制胜。而大理国的被平定，便使云南这一南宋的后方，一变而为包围南宋的重要基地。这说明，对大理国的平定确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一战，如果没有善战的军队和将领，这一胜利是不可能想象的。然而，蒙古贵族之所以迅速平了大理国，并且确立了对云南的统治，除了武力这一手外，还有十分重要的一手，这就是招抚、分化和利用原大理国的统治者，将他们的传统力量充分调动起来，这一手的重要性并不亚于武力的作用。这一不容忽视的基本历史事实，恰恰是泰族南迁论者的弱点。”

“在平大理国的军事行动中，忽必烈在招降、分化和利用对手方面是很注意的。为了招降大理国主，忽必烈在进军途中曾两次派出使者，头一次是从甘肃派出的，没有到达大理；第二次派出的使者又被大理国主杀害。但在大军渡过金沙江后，忽必烈接受了摩娑蛮主（纳西族首领）的迎降。在进攻大理城时还改变了‘屠城’政策，并下了‘缓杀百姓’的命令，并对大理国贵族进行了区别对待：对预抗不降的权臣高祥，采取了杀头的办法，对虽曾进行抵抗但愿意归降的大理国主段兴智，则加以收买利用。”

仅从以上摘录自利吉先生的著作和克立亲王翻译的文章的内容来看，可以认定，大理国确实落入了蒙古军队手中，虽然在时间的记载上有所出入，但克立亲王翻译的文章内容可以说明：泰族之所以没有逃亡，是由于忽必烈改变了政策，即停止了曾经在欧洲东部地区推行的屠杀百姓的做法，“结果，蒙古贵族对大理国段氏政权采取的措施很快就见成效。公元1255和1256年，段兴智两次入觐，向元宪宗蒙哥献上了云南地图和征服未降部落的计策……。”

大理国主投降后，充当了忽必烈的先锋、顾问和镇压云南未降部落的响导，协助蒙古人将势力范围扩张至东南亚的越南。公元1264年，云南爆发了有十万各族人民参加的为独立而斗争的起义，斗争迅猛发展，为独立而战的起义军占领了新兴、石城、威楚和昆明等许多城镇，蒙古守将无法抵挡，便向大理段氏政权告急，大理国主信苴日派兵支援，与蒙古守军联合，夺回上述城镇。

从以上事实，他们得出结论：蒙古人之所以能征服南诏，最主要的原因是，南诏王投降了忽必烈，并且协助蒙古人镇压了反抗者。云南爆发的大起义，而且花了十年功夫才荡平这一点，就足以证明：他们并未迁徙逃往何地，而是一直在南诏坚持斗争到底（克立·巴莫语，一九七八年）。

在以后对南诏的统治过程中，整个元朝时期，蒙古贵族同意让南诏王实行自治。从佛历一八二〇至一九一〇年（公元1277—1367），蒙古对中国的统治长达九十年。但到元朝末年，这段时间和当时（泰国的）乌通王朝末年大体一致（佛历一八九三至一九一二年，即公元1350—1369年），蒙古贵族限制了云南地方政权的势力，大理府的南

诏王被任命为蒙化王；不再像过去那样对整个大理实施统治，大理国主的后裔也只承袭了这一职务，但仍驻在大理。最后终于发生对抗，爆发了大理段氏与元朝在滇西的总督——梁王（译注：原文如此）之间的战争，梁王也无可奈何。根据上述内容，没有任何一点可构成发生迁徙逃离的理由。

从上述内容来看，有的人可能迷惑不解，例如文章中提到：“段兴智曾入觐，向元宪宗蒙哥献上了云南的地图……”。那么宪宗皇帝究竟是谁？有必要回过头来对这一段中国历史进行一些解释。

当忽必烈汗大约在佛历一七九〇年（公元1247年）征服云南时，中国还处在宋朝第十四世皇宋理宗（佛历一七六八至一八〇七年，公元1125—1264年）的统治下。以后宋朝又经历了三个皇帝；即宋度宗（佛历一八〇八至一八七七年，公元1265—1334年），宋恭帝（佛历一八一八——一八一九年，公元1275—1276年）。佛历一八一八年（公元1275年），忽必烈派兵攻占南京，宋恭帝被俘，死于途中。蒙古军撤出后，臣僚们恭请宋度宗之子登基，为第十七世皇，同年（佛历一八一九年，公元1276年），蒙古军再次攻打南京，新登基的皇帝宋端宗乘船由海路逃跑，敌人水军及时赶到，宋端宗投水自尽，从而宣告了宋朝的复灭。忽必烈自封为中国皇帝，号称元世祖。很可能（元世祖）和克立亲王所提到的元宪宗皇帝是同一个人。（元世祖）于佛历一八二〇年（公元1277年）在北京举行登基大典，并将他的祖父成吉思汗上尊号为元太祖。当时的中国老百姓似乎并不反对由外族人为王来统治自己，也可能慑于元世祖既征服了亚洲又征服了欧洲东部的威望。当时蒙古、满洲、西伯利亚、波斯、阿富汗的统治者，曾将元世祖尊称为“蒙古大汗”。除上述原因外，当时宋朝最后一个皇帝统治下的中国，政局腐败，朝廷得不到忠臣的支持，失信于民。元世祖则下谕起用好几位遭陷害被迫弃官的南宋遗臣来辅助他治理国家，其中贺仁杰被命为左丞相，杨恭懿被命为军师并负责教育太子，张文谦受命任职魏国公，徐世隆任职吏部尚书，云从龙被任命为云南、广东两省行省参政（译注：系湖、广两省行省参政之误）。

元世祖在位十三年（译注：原文如此），即佛历一八二〇——一八三三年（公元1277—1290年）。据利吉先生的著作说：佛历一八二五年（公元1282年），中泰两国已有交往，元世祖派管军万户何子志为友好使臣赴素可泰晋见兰甘亨。佛历一八三五年（公元1292年），广东道宣慰司将暹罗国送来的文书“金册”转呈中国皇帝。佛历一八三七年（公元1294年），暹罗国王兰甘亨（或敢木丁安西兰玛叻）亲赴中国，朝见中国皇帝。兰甘亨是否亲赴中国一事，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克立亲王断然否定这种说法，他写道：“我们确认，兰甘亨并未像我们过去相信的那样去过中国，去过中国的只是当了王储的王太子，而且是以人质的身份前往的。根据元朝安邦定国的政策，其目的在于不让他的父王在这个地区进行战争，扩张势力。这就表明，兰甘亨的势力已强大到足以使周围邻国惧怕的程度，所以他们才不得不向中国皇帝呼吁，要求进行干预，以‘维护安宁’。”

这真是奇文，因为按照常规，只有军事上弱小的战败国才将王子送去作为人质，战胜国为了预防战败国再闹独立，才强迫（战败国）送人去作为人质，就像（大城王朝）那黎萱大帝被他父王玛哈探玛拉差王——当时泰国形式上的统治者送往缅甸作为人质那

样。关于兰甘亨大帝是否去过中国的问题，看来它涉及在泰国建立“宋膠洛”瓷器业的关系大于政治上的原因。至于由海路前往中国，似乎没有什么困难，这一点在《北方纪年》一书中也有记载，但是，它将兰甘亨说得神乎其神，以致于现代的人都不敢相信。但是，一位独立的国王的出访，是完全可以像拉玛五世出访欧洲那样，作为一种荣誉来赞颂的。

如果上述纪年是对的，而且承认泰国的纪年也同样正确，那么，就可以认为：西英他拉蒂在素可泰建立的帕銮王朝（译注：即素可泰王朝）是在元世祖于佛历一八二〇年（公元1277年）入主中国之前；在大理国被蒙古军队征服之后三十年（佛历一七九〇年，公元1247年），还必须加上十年的平叛时间，即到了佛历一八〇〇年（公元1257年）。如果说泰国原先未曾有泰人居住，而是（从中国南方）迁徙来重新创立家园的，那么，二十年时间决不足以使帕銮王朝如此强大，甚至仅五年后，即佛历一八二五年（公元1282年），中国就派出使者前来与素可泰国王兰甘亨敦睦邦交。这表明：建立素可泰京都的人不是那些被战败后从中国南方迁徙来重建家园的人们，而且素可泰京都的地位一定非常巩固，当此情况传到中国，强大的中国皇帝——伟大的大汗才愿（与素可泰）发展友好关系。

（泰国）与中国元朝的交往，没有在元世祖时代就中止，到了元世祖的孙子元成宗时代（佛历一八三八至一八五〇年，公元1295—1307年）仍有记载，佛历一八四〇年（公元1297年）兰甘亨时代，暹国和罗斛国的国王晋见，元成宗赐给锦衣和珠宝。到元朝第四世皇元仁宗时代，中国的史书记载，佛历一八六六年（公元1323年），帕昭勒泰时期（佛历一八六一至一八九七年，公元1318—1354年），暹国派使者出使中国，敦睦邦交。这一点和素可泰的史料是一致的。

从第六世皇（元泰定帝）时代起，元朝逐渐衰败，到了第八世皇元顺帝时期（佛历一八七六至一九一〇年，即公元1333—1367年），福建、浙江、江苏、江西和安徽等省百姓纷纷起义。佛历一八九一年（公元1348年），起义首领朱元璋讨平了其他叛乱者，并在佛历一九〇九年（公元1366年）率二十五万大军攻陷北京，元顺帝逃回故乡，死于佛历一九一三年（公元1370年），从而结束了蒙古皇帝的统治。

佛历一九〇一年（公元1358年），朱元璋登基，国号明，建都南京（泰国正值乌通王或称帕拉玛特波蒂一世王的末期）。

明朝统治中国后，发兵三十万征讨元朝在云南的梁王军队，梁王自杀，但是云南的段氏政权仍不服，中国军队战胜了云南军队，逮捕段氏家族兄弟两人押解北京（译注：原文如此），地方官员被解除职务，由中央从北京派官员接替。当时泰国正值阿瑜陀耶朝代初期，如果说有大量移民从云南迁徙进来，那么，阿瑜陀耶王家编年史必定会有某些记载谈到此事。

明太祖在位时期（佛历一九一一至一九四一年，即公元1368至1398年），虽然中国正忙于征讨当时统治南诏的蒙古人，以及重建对南诏的统治，明太祖也未中断与泰国的交往。佛历一九四一年（公元1398年），正值阿瑜陀耶的统治者帕拉差特叻一世时期（佛历一九一三至一九三一年，即公元1370—1388年），（明太祖）曾派遣使臣吕宗俊前往暹罗建立友好关系，并（将当时暹罗的情况）作如下记载：由于坤銮帕娃（译注：

即帕拉差特叻一世)篡夺了暹国帕拉默萱(侄子)的权,造成当时暹国三足鼎立的局面:一、坤銮帕娃统治了阿瑜陀耶;二、帕拉默萱统治了华富里;三、帕那坤英统治着素攀武里。佛历一九一七年(公元1374年),帕那坤英亲自前往中国,被授予玉玺,刻有六个汉字,译为“暹罗国王之印”。

克立亲王的译文继续说:大理国段氏家族是白族,在段氏家族统治下的人民,除了作为主体民族的白、彝两族外,还有傣、哈尼、纳西、傈僳、阿昌等许多民族。傣族就是泰人,现今居住在西双版纳和德宏的泰人,从未迁往何地,在中国有着他们悠久的历史。

据同一时代李京所著《云南志略》记载,李京所称的泰人——白夷,在云南为数最多,北至吐蕃,南抵交趾,即越南南部。可见,泰人在元代的分布和现在一样是相当广的。

“现今泰人所居住的地方不算小,它不仅仅只是泰国,而是包括中国的几乎整个云南以及四川、广西和贵州,还有奠边府、缅北的整个掸邦,老挝和泰国。上述整个面积相加,几乎等于中国的面积。”(译注:中文原文没有这段内容,是克立的评论。)

这篇译文还回顾了汉代的历史事实,文章说:“远在西汉(译注:中文原文是唐宋),有关泰族的记载十分具体,他们被称为‘金齿’、‘银齿’、‘黑齿’、‘茫蛮’、‘白衣’等等;他们居住的地区连成一片,从红河两岸到怒江以西,并且一直到中国北部的保山和景东(译注:中文原文是“北到保山、景东”),以农业生产为主,并有以金、银饰齿的风俗,以致中国人称他们为‘金齿’和‘银齿’,还有纹身、纹脚和纹面的习惯……”

“据《后汉书》记载:公元一世纪末二世纪初(一八七年以来)永昌境外的掸国国王雍由调曾于公元九十七、一二〇和一三一年,三次遣使到东汉的首都洛阳访问,中国朝廷给予泰人的使者很好的接待,(东汉)皇帝赐给雍由调‘金印紫绶’,以及‘汉大都尉’的封号。(雍由调)第二次遣使到洛阳时,还向东汉皇帝敬献了乐队和魔术师,并在宫庭作了多次盛大的表演。随同掸国使者的翻译,辗转翻译了两三种语言,才能和中国方面通话,这说明了掸国与汉朝在民族语言和地域上的距离。”

至于谈到居住在现今泰国土地上的泰人,文章说:“泰族是泰国的土著居民,有着悠久的历史,并非从任何地方迁去的。”

汉朝分为两个阶段:佛历三三七至五六六年(公元前208—公元26年)为第一阶段,汉朝的开国皇帝是汉高祖,他是在推翻了秦始皇的儿子的政权后即位的。秦始皇是中国长城的建造者,佛历三三〇年(公元前213年)下令百姓焚书的人。汉高祖传位十二世后,皇帝被宰衡王莽处死,又立汉高祖的后裔为帝,在位三年,被王莽废黜,他自封为皇帝,在位十四年,被汉高祖家族推翻,汉朝家业得以持续;改称后汉,佛历五六七至七六一年(公元24—218年),传位九世。佛历六〇〇至六一七年(公元57—74年)后汉二世皇时代,大乘佛教传入中国后为人们普遍信仰,并且一直传到高丽,以后经高丽又传入日本。据史书记载:(后汉)第四世皇帝时(佛历六三一至六四七年,公元88—104年)中国发明了造纸术。

在上述时期内,利吉先生在他的著作中关于泰族作了如下记载:

佛历纪元前一五三至一七九年(公元前696—822年),罗国的泰人从枝江出发,

南渡扬子江，来到平江定居。佛历二九六至七六一年（公元前247—218年）秦、汉时期，原定居在山西、河南、湖北的泰人（或罗国人）渡过扬子江进入湖南。

到了秦代，泰人（或罗国人）分成两大部份，一部份为不愿跟随罗国国王入蜀（四川）的，这部份人又分成两股，第一股，即聚居于故乡的人。以后这些人分别迁入福建的罗源，广东的罗定、罗肥、罗旁；广西的罗城、罗和、罗淡、罗龙等城镇居住。现在这些地方仍有泰人或罗人居住，同族间仍操泰语。

第二股，即那些不甘充当中国皇帝臣民的人，纷纷离乡背井，逃入湖南、广西和广东的山区，经过若干代后，逐渐成为当地的山民。后来，其中一些人又向南迁徙，进入西双版纳，成为现在老挝的泰人。

另一部份随同罗国国王从平江迁徙的泰人，入蜀（四川）后，分别在四川的罗江，云南的罗山、罗望、罗次、罗平以及贵州的罗为、罗斛、罗婺等地定居。

利吉先生著作中的记载，支持了中国历史学家撰写的文章（译注：利吉的这些说法，同《忽必烈平大理国是否引起泰族大量南迁》一文的内容是完全不同的。），分歧的地方似乎只是（兰甘亨）是否去过中国。但是，如果与泰族是否南迁一事相比，南迁问题就显得（比分歧）更为重大的事情了。

在结束本文之前，我还想回顾一下西汉史书中有关泰人饰齿的记载：泰人被称为“金齿蛮”、“银齿蛮”和“黑齿蛮”。关于泰人因其特点而被称为“金齿”、“银齿”和“黑齿”的问题，莫特博士也曾经提到过。他并且以语言和中国人的著作为依据持否定观点，不相信有大量泰族在南诏聚居。虽然莫特博士的著作当时在知识分子中曾引起许多议论，但其内容起码支持了下列看法：既然南诏没有大量泰人，迁徙之说也就无从谈起；它说明素可泰京都的建立者，当然也就是自古生息在泰国的泰人。仅只是莫特博士没有象近期研究工作中所提到有关大理泰人历史那样的根据罢了。

（古代的）饰齿不像现代使用金、银和牙科材料做成牙型进行镶嵌，或者只镶牙齿的某一部份，而是用颜料涂染牙齿。染色前，必须先将靠嘴唇的牙面釉磨去，涂染的颜色才不易脱落。在泰国，曾在北碧府班搞村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骨骼中，发现磨过的上门牙。较近代的发现有：佛统府佛统县踏銮区出土的堕罗钵底时代的骨骼；最新的发现有：乌泰他尼府会卡肯区出土的埋葬在缸内的一具属素可泰时代或大城时代初期的骨骼（瓦他那·素帕宛及索·汕威迁发掘）。目前，这种饰齿的习惯，还在那空是贪玛叻府保留。这就证明：饰齿是流传了近四千年的风俗。对泰国来说，它还是除了骨骼和陶器的特征以外的另一种根据，说明四千多年以来泰人就一直生息在泰国这块土地上，而且就是这些泰人建立了素可泰国，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而素可泰国）并非是从中国南部迁徙来的南诏人建立的。

简佑嘉译 谢远章校